

画说建党百年 3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从《红军过草地》油画说起

曲星

油画《红军过草地》
张文源作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提出的明确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才刚刚开始，只有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红军长征的胜利在世界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关于长征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屡见不鲜。在众多以长征为题材的油画中，张文源创作的《红军过草地》油画尤为著名。该作品创作于1977年，尺寸为300×184厘米，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2006年，该画曾作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4张纪念邮票之一公开发行。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

百个团，共经过11省，翻越18座大山，渡过24条大河，其间穿越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攀越连绵起伏的雪山，行程约二万五千里，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长征中最艰难的路程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没过草地路，难知长征苦。草地行军所遇到的困难难以想象。有时候，两三百米的距离，红军队伍走了近一天还没走出去。面对死亡的威胁，红军战士依靠积极乐观的革命精神、坚韧不拔的钢铁意志以及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前仆后继，艰苦奋斗，用热血和生命在亘古荒原上完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军事壮举。

《红军过草地》油画用细腻的画笔，描绘了红军战士在环境恶劣的草地上艰难前进的场面。前景一组战士，步履艰难地在泥泞中前进，他们相互搀扶、携手并进；中景的指挥员一边行进，一边聆听藏族向导介绍地形；后景一组战士，正奋力将一匹陷入沼泽的驮马拉出险

境。一杆红旗迎风招展，宣传员正在给后面的部队鼓劲呐喊。整体画面表现了红军战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坚强意志，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英雄气概。画面还采用前景部队已经沐浴在阳光里，而后续部队仍被乌云笼罩的处理方式，既突出了光明前途的寓意，又非常符合草地风云骤变的自然天气特征，使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有机相融。

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中，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长征精神依然是我们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进行伟大斗争的精神动力与前行“灯塔”。

我是一名老党员，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我前往嘉兴南湖寻根，细雨蒙蒙中，登上烟雨楼眺望。

站在楼台上向湖面望去，南湖的烟雨苍苍茫茫。那一阵阵细雨飘过，腾起无边的雨幕，把偌大的湖面遮掩得一片迷蒙。何处是岸？何处是征帆所指的航向？

透过苍茫的烟雨，我仿佛看到：1920年2月的一天清晨，在北京郊区的雪野中，一辆骡子拉的双轮篷车出了朝阳门，奔跑在通往天津的路上。坐在骡车里的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头上戴着毡帽，身穿沾满油渍的背心，看起来像个土财主。跨在骡车车把上的是北大教授李大钊，打扮成收账的生意人模样，不时挥着手中的鞭子，“驾，驾”地吆喝着。谁也想不到，就在这辆骡车上，两个人正在商量着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像俄国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政党。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是中国最早酝酿创建共产党的开拓者、创始人。

加快脚步向四面望去，南湖的烟雨缥缈缥缈。那无边无垠的烟雨，掩护过在游船上开会的一大代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心灵吟唱

从南湖烟雨中走来

天柱

透过缥缈的烟雨，我仿佛看到：1921年7月23日晚上，董必武、毛泽东、李达、周佛海、包惠僧等13位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陆续走进上海法租界的一幢石库门。风雨如磐的石库门，在刚下过雨后的夜色中显得更加凝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

代表们报告了各地党组织的情况，商讨了大会的任务和议程，之后便开始讨论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7月30日，会议进行到最后一天，有侦探闯入，被迫中止，代表撤离。随后经商议，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8月3日，南湖下起了小雨，代表们在租借的一条游船里完成了会议最庄重的议程，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下午6时左右，在轻轻齐呼的“第三国际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中共一大宣告闭幕。南湖红船由此载入史册。

放慢脚步向红船望去，南湖的烟雨浩浩荡荡。我下了楼走近红船，它静静地停靠在岸边，历经百年风霜雨雪，依然那么气势磅礴，人们跋山涉水来学习、践行红船精神。

透过浩荡的烟雨，我仿佛看到：从南湖起航的红船时而暴雨袭来，时而洋流汹涌，时而航线拐弯，时而礁石峥嵘，一路勇往前行。中共二大回到上海，三大转往广州，四大重回上海，五大前往武汉，六大跨境莫斯科，七大进入延安，此后便以雄伟的北京人民大会堂作为固定的出航进发之地。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每一次召开的党代会，都解决了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步深化的一些重大问题，领航党和国家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线，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我满怀深情从南湖的烟雨中走来，走过苍苍茫茫的烟雨，走过缥缈缥缈的烟雨，走过浩浩荡荡的烟雨，走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文化春秋

娄烦作证

张石山

咱们山西地面，截止到清朝末年，府道州县行政区划设置，在传统上和老百姓的叙述中，叫做“九府十六州，一百单八县”。说来顺口，也便于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后，县名有所频繁改动。比如：为了纪念抗日名将左权的牺牲，将辽县更名左权。比如：将临晋和猗氏合并为临猗县，将万泉与荣河合并为万荣县，将洪洞与赵城合并为洪县最后更名洪洞县。等等。

其中，以娄烦县的设县、定名，历来颇有说道。

1971年，国务院决定恢复或曰重置历史上著名的娄烦县。

或则由于歪风作怪，“娄烦”县竟然莫名其妙成了“娄烦”县。

习惯上的解释是：由于当时的工作人员，缺乏相关历史知识和地名标准化意识，竟然误将当地群众所写错别字“娄烦”，在文件中作为标准地名上报。

不论什么原因，把“娄烦”改为“娄烦”，成为“文革”时期的独特产物；娄烦，将错就错，以致被国家正式命名。

应该承认，众所周知，今日之娄烦者，实乃古之娄烦也。

古籍曾有记载曰：“周王绘图有娄烦国”。所以有一种说法称，娄烦不是北方狄族，而是周天子的属国，曾被封为子爵。

而更为可靠的史料记载，娄烦原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或部落的名称。从西周春秋乃至下迄秦汉，中央政权始终必须面对娄烦国的强大而实际的存在。

战国时代，先是历史上著名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娄烦国为赵武灵王所破，归属赵国。更为著名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把中国划分36郡。后来扩展为46郡，增设了娄烦郡。直到这时，娄烦一直不曾亡国，仍然活跃在黄河中游的河套地区。到了公元前127年，西汉大将卫青“略河南地”，方才赶走娄烦王，在此设朔方郡。从此，娄烦部族似乎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中。

娄烦国灭亡了；娄烦人也仿佛消失了。然而，娄烦国曾经存在；娄烦民众生存繁衍过的地方还在。在中央政权的行政区划中，娄烦最终变成了一个地名。

这个富含历史传承意味的地名，就在上述地方以郡、州、县、镇的名堂一直延续了将近两千年。

这，成为华夏文明史上的一个历史现象，或曰文化现象。这个现象的存在，足以发人深思。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武灵王攻破并战胜娄烦国后，并没有诛杀他们的人马。而是采用了“致其兵”的策略，把娄烦军将收容改编，继续为赵国所用。

自古以来，主要在黄河流域繁盛成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接壤地带的游牧文明，两者之间的冲突与融汇，始终没有停止过。

气象学家的研究证明：上述两种文明之间，是隐约可见、曲折回环的一条400毫米降水线。降水量的多寡，大致决定了两种文明、两种生产方式的分界线。

两种文明地带，呈犬牙交错的状态。尽管历来难免相互冲突，但也绝对对曾经相互渗透。

在东亚这个巨大的板块上，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中央文明，我们称作华夏文明；这个文明崇尚自然大道，讲求和谐中庸；倡导和而不同，希望和谐万邦。奉行存亡继绝，而非赶尽杀绝。

早在春秋时代末期，著名的韩赵

魏三家分晋之后的赵国，将太行山东部曾经立国百年的狄族国家“仇犹国”，并入赵国版图。仇犹国原住民，并没有离开家园。他们渐渐吸纳服膺了农耕文明，古仇犹国最终成为赵国的内地，成为中国的内地。

同样的，娄烦，游牧文明建造的那个曾经强大的娄烦，作为曾经的悠久的娄烦国是消失了。但我相信，娄烦国的人民没有消失。娄烦国归入大中华的版图，这儿的人民渐渐化进了整体华夏民族之中。

娄烦，作为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含量的名词，数千年载于史册。娄烦，作为一个因袭了“娄烦国”的历史而存在的地名，数千年存在。娄烦，作为中央政权的郡县治所，曾经在朔州、曾经在原平、曾经在静乐。不论它在哪儿，它始终不曾消失。

它是曾经的历史，它是古老的国度，它是华夏文明的构成，它是雍容博大的、气度恢宏的、兼容并蓄的、万邦协和的东亚文化的光荣证明。

这一切，历史性地加载到“娄烦”这个地名词语的肩上。

娄烦作证。